

纪念莫友芝诞辰200周年
暨遵义“沙滩文化”学术研讨会

论文汇编

(补编部分)

二〇一一年六月

贵州·遵义

讀莫友芝唐本說文木部箋異四則

竺家寧 (台灣政治大學)

一、前言

莫友芝生於1811年，卒於1871年，字子偲。據說他在七歲的時候，就開始閱讀《毛詩》、《尚書》等古籍。在清道光八年（1828年）考取了秀才，又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考取了舉人，後來多次考試都沒有登榜，在曾國藩幕府中工作，為曾國藩收購江南遺書，後又為曾國藩督領江南官書局，擔任校勘經史之職。也就是在這一時期，他潛心於版本目錄學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當時與遵義鄭珍齊名，並稱西南巨儒。他的學問十分廣博，包含了蒼雅、故訓、六經、名物、制度，都有深入的研究。莫友芝是晚清的金石學家、目錄版本學家、書法家，也是宋詩派的重要成員。他曾經在遵義湘川書院講學。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撰成《遵義府志》48卷，與同時代的其它方志資料相比，《遵義府志》體例完備，材料翔實，史學界認為可與酈道元的《水經注》齊名，梁啟超譽為「天下府志中第一」。

莫友芝目錄學代表作有二：一是《宋元舊本書經眼錄》，這是他從同治乙丑（1865年）至己巳（1869年）數年間客遊上海等地時所見宋、金、元、明槧本及舊抄本、稿本的記錄，後由其子莫繩孫彙編成冊；一是《邵亭知見傳本書目》，這是他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上所作的版本箋注，是版本目錄學史上的代表作。同治四年（1865年）莫友芝任金陵書局總編校，定居金陵，以“影山草堂”作為書屋的名字。影山草堂收藏的書籍以明清精刻、精抄、精校本為多，尤其以唐寫本《說文解字》殘本最為珍貴，是唐憲宗元和年間遺物，曾國藩見此書後，讚歎不已，即命刻版傳世，並為之題詞：“插架森森多於筍，世上何曾見唐本！”同治十年（1871年），到揚州、興化等地尋找四庫全書被焚後散失的圖書，半路上突感風寒，高燒不退，不幸病逝船中。第二年，歸葬於遵義新舟青田山。曾國藩親筆書寫了一幅挽聯：

京華一見便傾心，當年虎市橋頭，書肆訂交，早欽宿學；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淚，來吊。

他的著作有《聲韻考略》4卷、《宋元舊本書經眼錄》3卷、《附錄》1卷、《樗萌譜注》1卷、《亭書畫錄》、《唐寫本說文木部箋異》、《亭詩鈔》、《亭遺詩》、《亭遺文》、《影山詞》、《資治通鑑索引》等。其中《唐寫本說文木部箋異》一卷，為聲韻、訓詁研究之重要著作。中華書局《莫友芝年譜長編》（張劍編著）編入存世的所有《邵亭日記》及兩百多封邵亭書信，蒐羅了近百種莫友芝刊本、稿本和鈔本文獻，對莫友芝的事蹟、著述作了詳細編年，是我們全面瞭解莫友芝的重要參考資料。

二、論柵字的音讀(國語音詐)

【唐本說文】柵，編豎木也。從木，刪省聲，義白。

【莫友芝箋異】「刪省聲」，大徐作「從冊，冊亦聲」；小徐、《韻會》引作「冊聲」。按：今

官寺街巷排豎木爲門闌，謂之柵欄。柵，音如沙，或如薩，皆「刪」音之轉。《廣韻》、《韻會》「柵」有「所晏切」。《廣韻》訓「籬柵」。《集韻》訓「編竹木爲落也」。又有「數眷切」，訓「籬也」。皆即今「柵欄」義，音與「柵」近。豈許書本有「刪」、「冊」二聲。

莫友芝依照《唐本說文》提出的「柵」字音讀的討論，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音讀問題，台北市有一個地名叫做「木柵」，過去也曾經爲這個字的音讀做過許多討論，後來《國語辭典》定爲音「詐」，又讀爲「善」音。這個字所牽涉的讀音還包含了它的聲符「冊」字（冊亦聲），「刪」字（刪省聲）。以及莫友芝提到的「音如沙，或如薩」。

我們從古音來源看，《廣韻》、《韻會》「柵」有「所晏切」，拼出來是《國語辭典》所定的「善」音。

依據《說文解字詁林》，柵字：編樹木也。一切經音義卷十八、十九引樹作豎。玉篇注亦作豎（說文校錄）。又編樹木，從木冊聲，妻側反（說文繫傳）。又從木從冊，冊亦聲。冊亦編竹也，楚革切（說文句讀）。這裡說的「妻側反」和「楚革切」就是「冊」的讀音。除了「薩」一音，「冊」音是幾個「柵」的音讀中唯一的入聲唸法。

至於「木柵」《國語辭典》定爲音「詐」，大陸編的《漢語大詞典》也定爲「詐」音。其來源又是什麼呢？又「刪」、「沙」、「薩」三個字音的來源又是什麼呢？

筆者認爲，我們把所有可能的音讀分爲三類：

1. 「所晏切」和「刪」兩個唸法，屬陽聲韻，帶鼻音韻尾-n。
2. 「冊」音和「薩」音，屬入聲韻，前者帶塞音，後者帶塞音-t。
3. 音「詐」、音「沙」，屬陰聲韻，不帶輔音韻尾，是開音節。

這樣，我們就大致可以看出這個字的歷史發展。最先是第1、2種音，先形成-n和-t的方言交替，「冊」-k一讀可能是-t的方言變異。他們都是早期帶有輔音韻尾的唸法。第三種音是後世失落輔音韻尾形成的唸法。所以不見於早期注音。 依據道光年間《增廣字學舉隅》：

「柵字，楚各切，音策，豎木以立柵柴也。俗讀若乍。」俗讀若乍，這是讀爲開尾韻的最早紀錄。時間已到了清代中葉。現代客家話「柵」字讀作：「tshak⁵」，閩南話俗讀作：「sa⁴⁴」、又讀「tshik」，其中的「sa⁴⁴」正是後起的開尾唸法。而「tshak⁵」、「tshik」兩音則是來自「冊」-k一讀。

「柵」字在聲母方面，主要有s-和tsh-兩種變異。捲舌音是由s-發展出來的。早期的s-和tsh-兩種變異，都屬於齒頭音，一個是擦音，一個是塞擦音。這兩種聲母在方言中發生轉換是很常見的，例如「鼠」在方言中就有塞擦音一讀。「屬」字可念爲擦音的shu也可以讀爲塞擦音的zhu（章母）。其演化如下表：

-n「所晏切」和「刪」-t(-k)「冊」音和「薩」音>-ø音「詐」、音「沙」

三、論柂字的音讀（國語宜、墮二音）

【唐本說文】柂，落也。從木，也聲。讀若池，力支。

【莫友芝箋異】柂，「力支」，大徐：「池爾」。按：「力支」一紐，音最確。《說文》無「籬」

字，「柂」即「籬」也，故次「柵」後。《篇》、《韻》皆失此音。唯《集韻·支部》：「籬、柂、櫛」同字，「鄰知切，藩也。」《一切經音義》亦謂「柂、櫛、籬」三字同，引《通俗文》：「柴垣曰柂，木垣曰柵」為證。是《集韻》所本，得之。

這個字在國語裡頭很少用到，但是從文獻資料的注音當中，可以看出反映了上古複聲母 *dl-* 的痕跡。從音讀上，顯然有兩系來源，一是「力支切」、「鄰知切」（讀為 *l-*），一是「讀若池」、「大徐池爾切」（讀為 *d-*）。那麼，它就有可能是從 *dl-* 聲母發展來的。在不同的方言中分化為 *d-*、*l-* 兩讀。

這個現象我們也可以從「也」字、「離」字的聲系中找到痕跡。莫友芝考出「柂」即「籬」也，又「籬、柂、櫛」同字。從語音上看，「也」為喻四，李方桂擬為 *r*-音（近 *l-*），從「也」得聲的字如「他拖地」，都是舌頭音。從「離」得聲的字，有念「擠齧」的舌頭音字，也有念「離璃」的 *l*-母字。所以來自上古 *dl-* 的痕跡十分明顯。

這個 *dl-* 聲母在上古形成了一個嚴密的系統，例如：

tl->t- 了 *l-/l-*：釘 *l-/l-*

tdl->td- 賴 *l-/l-*：賴 *l-/l-*；豐 *l-/l-*：體 *tdl-/td-*；連 *l-/l-*：鏈 *td-/td-/l-*

dl>l- 豕 *l-/l-*：豕 *l-/l-*

ddl>dd- 童 *ddl-/dd-*：龍 *l-/l-*

「柂」字台灣的教育部《國語辭典》未收。《說文解字詁林》柂，落也。從木，也聲。讀又若地。柂之讀又或如地。地，古皆作他，非也。（說文段注）

四、論杞字的音讀（國語音起）

【唐本說文】杞¹，畱也。從木。已聲。一曰從土，韋¹⁴也，齊語讀若駭。里。裡，杞或從里。

【莫友芝箋異】杞，二徐本篆作「𣎵」。「里」，徐音「詳里」。

又按：「里」音最古，疑是《音隱》之舊，為唐宋韻書所遺。漢人讀「里」如「以」。《周禮·匠人》：「里為式。」注云：「里讀為以，聲之誤也」可知「里」是「以」音，非若今「兩耳切。」

這個字在國語裡頭也很少用到，但是從文獻資料的注音當中，可以看出反映了上古複聲母 *kr-* 的痕跡。從的莫友芝考定中，認為「杞」的「里」音最古，說明它原本有類似來母的一讀，又說「漢人讀里如以」，「以」在漢代是喻母四等字，依據李方桂的考定，讀作 *r*-音，來母的 *l* 和 *r* 都是流音，性質相近。至於「徐音詳里」是邪母的讀法。依據李方桂的考定，邪母也是讀作 *r*-音。

𣎵 《說文解字詁林》云「杞」畱也，從木呂聲，一曰從土韋¹⁴，齊人語也。臣鉉等曰今俗作𣎵，詳里切。裡，或从里。（依據徐鉉說文）。又云畱也。從木呂聲。一曰從土韋¹⁴。孟子音義云：裡，土韋¹⁴也，本此。裡，或從里，呂聲里聲，同在一部。（依據說文段注）

¹ 《異體字字典》杞之異體字。

由此可知，莫友芝的考定是正確的。也就是「杞」字原本有 l-或 r-的念法。無論是詳里切、呂聲里聲、漢人讀「里」如「以」，結論都導向 l-或 r-的念法。

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依據台灣教育部《異體字字典》，「杞」爲「杞」之異體。音(一) ㄘㄧˇ(二) ㄌㄧˇ。《說文解字·木部》：「杞，枸杞也。從木己聲。墟里切。」今音 ㄘㄧˇ。《廣韻·上聲·止韻》：「杞，木名，又苟杞。墟里切。」字形作「杞」；《集韻·上聲·止韻》：「杞，木名，《說文》枸杞也。口已切。」字形作「杞」。按：「杞」、「杞」一從己、一從巳，本當爲二字，唯古書二字多混。以「枸杞」爲例，作「杞」字形者有《廣韻·上聲·止韻》、《精嚴新集大藏音·木部》、《字彙·木部》、《彙音寶鑑·居上上聲》、《中文大辭典·木部》、《漢語大字典·木部》等書皆作「杞」，而《龍龕手鑑·木部》、《玉篇·木部》、《集韻·上聲·止韻》、《類篇·木部》、《四聲篇海·木部》、《正字通·木部》、《康熙字典·木部》等作「杞」。考「杞」字甲文、金文皆從「己」，故以「杞」爲正字，則「杞」爲其異體。「杞」是它的另一個異體。

又依據台灣教育部《國語辭典》杞，注音 ㄘㄧˇ 漢語拼音 qī 名詞，見「枸杞」、「杞柳」等條。國名。周朝所分封的諸侯國。姒姓。故城在今河南省杞縣。 姓，如春秋時齊國有杞梁。

由此觀之，「杞」字原本還有舌根音 kh-一讀。如果說上述的 l-或 r-的念法和這個 kh-的念法同出一源，那麼，在音理上是不能互變的，我們也不能用鴛鴦式的辦法，閉目而不理會，說它本來就念得不一樣。剩下唯一的可能，就是和其他大量已經證實的 pr-(剝，象)，tr-(上古知系字)構成一個系統，念成 kr-。這類 kr-或 kl-的聲母也大量存在上古因當中。例如漢語內部的證據所反映出來的 KL- 型複聲母：

1.形聲

果 k-：裸 l-、各 k-：路 l-、東 k-：蘭 l-、兼 k-：廉 l-、監 k-：

藍 l-、降 k-：隆 l-、京 k-：涼 l-。

2.聲訓

《釋名》有：「寡 k-：偶 l-」、「領 l-：頸 k-」、「勒 l-：

刻 k-」；《說文》有：「牯 -：牢 -」、「老 -：考 -」；

《毛詩》音訓有：「流 l-：求 -」、「葭 k-：蘆 l-」、「穀

k-：祿 l-」。

3.又讀

《類篇》：《釋文》：「隔，音隔，又音歷」（孟子音

義）、「卷，居晚切，又力轉切」（儀禮音義）；《玉

篇》：「修，力救切，又居幼切」。

它們構成這樣的語音系統：

kl->k- 呂 l-/l- 莒 kl-/l-

kl->k- 立 l-/l- : 泣 ㄋㄧˋ- / ㄋㄧˋ-

ㄋㄧˋ>l- 兼 ㄋ- / ㄋ- : 廉 ㄋㄧˋ- / l- ; 京 ㄋ- / ㄋ- : 涼 ㄋㄧˋ- / l- : 諒 ㄋㄧˋ- / l- ;

果 ㄋ- / ㄋ- : 裸 ㄋㄧˋ- / l-

ㄋㄧˋㄋㄧˋ>ㄋㄧˋ 稟 <l-/<- : 凜 ㄋㄧˋㄋㄧˋ- / ㄋㄧˋ- : 懷 l-/l-

在從語音演化上來看，「杞」字上古念成 kr-或 kl-的聲母，後來產生分化，在不同的方言中形成了 k-或 kh-系一讀(從己聲、墟里切、枸杞 qǐ)，和 r-或 l-系一讀(漢人讀里如以、徐音詳里、或從呂聲里聲)。

五、論打字的音讀(國語聽、婷二音)

【唐本說文】杙，撞也。從木，丁聲。亭。

【莫友芝箋異】杙，「亭」；徐：「宅耕。」按：《廣韻·青部》無「杙」，兩見《耕部》。《集韻·青部》：「杙，唐丁切。」與「亭」音合，蓋舊音。

按：《類篇》：「杙。楔也。」意即段說「以此物撞出彼物」之義。黔蜀間呼撞出物曰棍，或呼如挺，或呼如頂，皆宜用「杙」字。又按：《一切經音義》：「打，音頂」，引《說文》「以杖擊之地」。本書《手部》無「打」，或是「杙」下「一曰」之義，為各本所遺。(注云：莫氏此說是據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六「打」字注語而作的推論。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六曰：「打，音頂，《說文》云：『以杖擊之也。』」《說文·手部》實無「打」篆，玄應書之「打」，當為《說文·木部》「杙」篆之訛俗字。)

今《廣雅》作：「打，擊也。梃也。」可證「打」為「杙」訛俗。(注云：莫氏謂《廣雅》「打」為杙訛俗，有據。又近人丁福保氏在其《正續一切經音義提要》中指出：「《續高僧傳音義》(九十三卷三頁)打注，引《說文》：『撞也。從手，丁聲。』又考《大方廣三戒經音義》(十六卷三頁)：『擊也。梃也。從手，丁聲。』而不知打即杙之俗字。《說文》『杙』訓『撞』也，與《續高僧傳音義》所引相符，惟隸變以手旁易木旁耳。」)

莫友芝指出，說文沒有「打」字，後世的「打」字是由「杙」字變來的。這個字音的演化十分特殊。今天是個不帶鼻音的陰聲字，古代卻是帶鼻音的陽聲字。這是聲韻學上「陰陽對轉」的現象。《上海話音檔》²：「打音 tā³⁵」，可知這個帶鼻音的念法，到了現代方言還保留下來。莫友芝指出，徐音宅耕反，又說《集韻·青部》：「杙，唐丁切。」與「亭」音合，蓋舊音。說明了「杙」字原本是帶鼻音的陽聲字。後來演化為「打」字，仍然有「打，音頂」的讀法。我們再看《說文解字詁林》杙，玉篇徒丁切。廣韻伐木聲也，中莖切，又宅耕切。(依據說文校錄)。又云：段玉裁注亦改撞，引通俗文曰，撞出曰杙，丈鞭、丈莖二切，與說文合，謂以此物撞彼物。(依據說文繫傳)。又云：杙，撞也。撞從手。各本誤從木從禾。今正。(依據說文段注)。這裡所引用的注音，「杙」字全都讀為鼻音，沒有陰聲韻的讀法。可以證明莫友芝的考訂不誤。

我們再看《說文解字詁林》打，打即杙之俗字。(清 鈕樹玉著 說文新附考)。又云：打，擊

² 侯精一主編《上海話音檔》頁9。

也，从手丁聲，都挺切，按古無打字，只用撻字。(清 王玉樹著 說文拈字)。又云：打，擊也，从手丁聲，都挺切。歐陽修歸田錄：打字當滴耿切，與說文合。(清 高翔麟著 說文字通)。

這些文獻資料說明「打」字，都挺切、滴耿切，也是讀爲鼻音。和今天的上海方言一樣。只有意義相同的「撻」字，才出現不帶鼻音的念法，和今天的國語一樣。我們懷疑「打」字、「撻」字應是同源詞。這是「打」字今天轉爲陰聲念法的關鍵。

考察台灣的規範音讀，教育部《國語辭典》打，注音ㄉㄚˋ 漢語拼音 tīng，名詞：地名。春秋時宋國屬地。故址約在今大陸地區河南省淮陽縣西北。又「打」字注音ㄉㄚˋ 漢語拼音 dā。擊、敲擊。如：「打鐵趁熱」。又音ㄉㄚˊ 漢語拼音 dā。量詞，計算物品的單位，爲英文 dozen 的音譯，十二個爲一打。如：「一打毛巾」、「兩打鉛筆」。《國語辭典》「打」沒有帶鼻音的念法。那麼，「打」何時開始不帶鼻音呢？

考查《廣韻》「打」見於上聲梗韻，德冷切。上聲迥韻，都挺切。念作「等、鼎」兩個音。沒有陰聲的念法。宋戴侗撰《六書故》都假切，是念爲陰聲的最早記錄。元代的《韻會》和明初的《洪武正韻》注音爲都瓦切，也是念爲陰聲。由此可知「打」讀爲ㄉㄚˋ da，始於宋代，元明以來，共同語就不在念爲帶鼻音的「等、鼎」了。在語音演化上，這是一種韻尾失落現象。而今日的吳方言失落鼻音韻尾之後，在前面的主元音上留下了鼻化音的痕跡(nasalized)。這是漢語方言中常見的演化現象。閩南方言就有很多的鼻化元音，往往是古代陽聲字變來的。其演化過程如下：

唐以前「打」(徒丁切、中莖切、宅耕切)→→→

「打」(音「等、鼎」)→→→

宋代以後「打」音ㄉㄚˋ da

六、結論

莫友芝在這部著作中，對古代漢語的訓詁和音韻問題，做了很多深入的分析與探討。其中有很多見解，頗具啓發性，能夠提供我們對於漢語的歷史問題做進一步的探索與發現。本文提出了莫友芝在這部著作中論及的四個字例，專就它的音韻問題切入，引用了相關的資料，做成進一步的分析。可以說是莫友芝觀點的延伸，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研究，能夠更完整的闡發莫友芝的學術方法、學術論點以及他的學術精神。由於筆者能力的限制，本文必然還有一些盲點或者不夠周密之處，尙祈同道先進不吝賜教。

莫友芝同治年間在福州的題字匾額

【參考書目】

張劍，陶文鵬，梁光華編輯校點《莫友芝詩文集》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01，2冊(1179頁)

張劍撰《莫友芝年譜長編》北京市：中華書局，2008.11，730頁

莫友芝著 梁光華注評 《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注評》，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莫友芝著《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莫繩孫纂錄，臺北縣永和市：文海，1984

莫友芝撰《莫友芝日記》著者手稿本 2 冊(線裝)，獨山莫氏遺稿，「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莫友芝撰《莫友芝書札稿》稿本 1 冊(線裝)獨山莫氏遺稿「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莫友芝撰《莫友芝詞》臺北市：新文豐，1996，148 頁

莫與儔《莫氏四種》台北縣永和鎮：文海，1969

黃萬機著《莫友芝評傳》貴陽市：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421 頁

薛雅文《莫友芝之目錄版本學研究》，2002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論文頁數：247

莫友芝《韻學源流》及其音韻學史觀

王松木

台灣·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

一、緒論—歷史文本的詩學特質

歷史並非只是一連串客觀事實的有序堆積，在編纂歷史文本的過程中，史家經常在有意無意之間，透過隱喻的方式，將個人的認知圖式融貫在歷史敘述裡，舉凡：如何篩選、剪裁史料，如何安排事件的發生順序，如何詮釋歷史事件的時代意義，如何論證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與演變過程…等，均不免受到史家個人之社會環境、學術思想、編撰目的等外在因素影響。正因如此，歷史文本與強調客觀性、邏輯性的科學報告有所不同，其文體性質反而較近似文學作品，因摻入編纂者的主觀意念而呈現出不同的敘述特色，體現出史家個人獨特的編纂風格。

歷史文本是「客觀事實」、「史家觀點」、「讀者反應」三者之間相互調適的結果。研究歷史文本，應當從多元的角度切入，除了依據文本記載還原曾經存在過的客觀事實之外，也應從「元史學」(metahistory)的觀點，¹探索史家的論證方式與意識形態，深入剖析史家獨特的編纂風格及其形成要素。然而，在實證主義的思潮之下，二十世紀初期的史學研究大多側重科學性、客觀性的層面，忽略歷史文本所潛藏的人文特質；1970 年代之後，隨著後現代主義浪潮的興起，歷史學者逐漸將眼光轉移到歷史文本的詩學特質上，[美]海登·懷特 (Hayden White) 在《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序言》指出史學研究的新轉向：

人們常說，歷史學是科學和藝術的一種混合物。但是近來，當分析哲學家成功地澄清了在何種程度上歷史可能被視為一種科學時，對歷史學藝術成分的關注卻不多見。通過揭示出一種特定的歷史觀念賴以構成的語言學基礎，我試圖確定歷史作品不可迴避的詩學本質，並且具體說明其理論概念被悄然認可的歷史記述中的那種預構因素。(頁3)

後現代史學所倡議的語言學轉向，²對於漢語音韻學史的研究，同樣具有高度的啟發性。後現代史學指引一條新的研究路徑，讓我們得以擺脫客觀主義的侷限，改從人文主義的角度重新解讀漢語音韻學史著作，更深入地探索編史者的編

¹ 語言學編史學的倡導者科納 (Koerner, 1995) 指出：「如果一個史學家不是考察歷史 (the history)，而是置身歷史之外，分析、評判其他史學家的作品 (histories)，那麼他所思考的就是超歷史 (按：元史學) 的問題。」(轉引自姚小平, 1996: 8)

² 韓震、董立河在《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西方後現代歷史哲學研究》一書的內容摘要中提到：「歷史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對歷史學的理論研究是有意義的。這種轉向把重點轉到了歷史學家表述了什麼和怎樣表述的問題上，揭示了歷史語言的非透明性和意識形態性，從而拓展了歷史學研究的視野。」

纂風格與音韻學史觀。

莫友芝《韻學源流》是漢語音韻學史的奠基之作，羅常培〈校印莫友芝《韻學源流》跋〉（1929）評論此書的貢獻，云：

清人推跡韻學沿革之作，前乎莫氏者，有萬斯同《聲韻源流考》及潘咸《音韻源流》二書。萬書匡廓粗具，罅漏宏多；潘書憑臆杜撰，難資典要。莫氏此書，理明事簡，弗尚煩紆，博瞻或弗逮萬，而糾纏贅亂之譏，庶幾可免。

二十世紀以來，漢語音韻學研究的重點在於「語音史」的建構，相較之下，音韻學史的編纂與研究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在羅常培（1929）之後，對《韻學源流》一書進行全面梳理、深入探究者並不多，據個人所見，僅殷孟倫（1963）與陳振寰（1988）二家而已。

殷孟倫（1963）最早全面評述《韻學源流》，其研究成果可概括為以下幾點：首先，分析《韻學源流》的編纂體例，追溯取材來源，解構全書的章節結構及其連貫關係，認為此書大多是抄錄前人之舊說，再稍加剪裁、補綴而成，極度缺乏原創性；其次，估量編纂者的音韻知識水平，認為編纂者的音韻知識仍停滯在乾嘉以前，篇中所引用之書主要為顧炎武《音論》、戴震《聲韻考》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種，不僅知識層面過於狹窄，且引文之中經常出現竄改顛倒或前後矛盾的弊病；最後，殷孟倫（1963）推論《韻學源流》的性質，認為頗似清末塾師所編定的學堂講義，懷疑此書的原編纂者並非莫友芝，³而是一位「略通音韻之學的老先生」，故對於此書的價值持保留的態度，主張「必須對本書仔細核校，摸清底細，作出較詳的校訂，然後肯定優點，指出錯誤，這樣才對讀者有益。」（頁441）

陳振寰（1988）回應殷孟倫（1963）的提議，詳細地對《韻學源流》進行全面地審訂與注評，除逐句檢證書中引述的事例之外，並加入個人的評語，或析評原作、或正謬補闕、或借題發揮，為今人研讀《韻學源流》提供了較為完善的注本。此外，陳振寰（1988）也對《韻學源流》編纂者的身份問題提出個人看法，他認為殷孟倫（1963）質疑此篇非莫友芝所作，但所列舉的證據卻不足以令人信服，⁴因而仍然傾向於贊同羅常培（1929）的意見，並進一步推測：《韻學源流》

³ 殷孟倫（1963）懷疑《韻學源流》非莫友芝所編纂，所持的理由有以下幾點：1.此書編纂者的知識層面狹窄，以莫友芝的學識及交遊情形而言，所接觸到的音韻材料當不至於如此狹隘；2.以莫友芝當時的聲望，應不至於點竄他人的著作為己作而以自污；3.當時《四庫全書提要》（1782）已頒行天下，若此書為莫友芝所編纂，難道不會招致「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的批評；再者，若莫友芝膽敢妄自竄改欽命官修之書，難道不怕惹禍上身嗎？基於上述理由，殷孟倫（1963）推斷此書或為清末塾師所編。

⁴ 陳振寰（1988）對殷孟倫（1963）所提出的各項質疑，逐一加以澄清，指出：1.《韻學源流》涉及的音韻材料狹窄，或因音韻學並非莫友芝所長，且此書具有草稿性質，可能只是隨手整理的讀書札記，並未有意想要刊印成書；2.引書未超出乾嘉以前，因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等名家之音韻論著刊行較晚，莫與儔、莫友芝父子蝸居貴州，或許未能親見研讀，加上莫友芝學術觀點趨於保守，非尚新求奇之人，故對於新興之學說未能大膽採納；3.乾嘉前後，引錄《四庫全書提要》而加以刪改者大有人在，不能據此判斷此書非莫友芝所編。有關《韻學源流》的作者問題，

可能是莫與儔在遵義府學教授樸學時所編纂的課堂講義，後經莫友芝紀錄整理成篇。關於此書的價值，陳振寰認為《韻學源流》雖存在著若干缺失與謬誤，但仍不失為「理明事簡」的漢語音韻學史，對普及音韻學與音韻學史知識具有積極的作用。

如上所述，歷史文本不僅是史家對客觀史實的理性闡釋，同時也潛藏著個人主觀的詩性預構。因此，今人想要全面地、合理地評述《韻學源流》，也必須同時兼顧主觀/客觀、學科內部/學科外部的因素，不僅要深入理解文本究竟「說什麼」（文本內容），更要追問「怎麼說」（文本形式）、「為什麼這樣說」（編纂者的思想）。然而，綜觀羅常培（1929）、殷孟倫（1963）、陳振寰（1988）三人的評述，大抵是站在「語音史」本位來思考問題，關注「語音史」與「音韻學史」連結的側面，並且基於客觀主義史學的觀點來解讀、評述《韻學源流》，因而著重於探究文本「說什麼」，卻忘卻了應當轉換觀看角度，試著站「音韻學思想史」立場思考，追問編纂者「怎麼說」、「為什麼這樣說」，從而釐清莫友芝的音韻學史觀，及其對《韻學源流》的敘述方式所產生的影響。

唯有同時睜開兩隻眼睛，大腦方能藉由雙眼視差（binocular parallax），精準地確定物體的方位與距離，從而產生深度感而能看見立體的影像；「語音史」、「音韻學思想史」是兩種不同的觀察視角，猶如雙眼之間存在的視差，在解讀、評價《韻學源流》時，必須同時整合來自這兩個視角所觀察到的信息，方能合理地賦予時代意義與價值。當代學者對《韻學源流》的歷史評價是否公允呢？各家有何對立、衝突的見解呢？如何從不同角度解讀《韻學源流》，為化解各家歧見建立起對話的平台呢？為了解答上述問題，本文擬參考「科學編史學」（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⁵的概念與方法，除關注《韻學源流》如何理性闡釋音韻學的發展源流外，更試著透過《韻學源流》的敘述方式，發掘文本所隱藏的詩學特質與意識形態。

本文主要內容有二：一、以《韻學源流》為研究對象，探究《韻學源流》的文本內容與敘述模式，解析莫友芝的音韻學史觀；二、檢視當代學者對《韻學源流》有何不同評價，試著調整彼此觀看問題的視角，提出更具全面性、概括性的評價模式，讓音韻學及其他人文學科的研究者得以彼此對話。希望藉由本文之論述，補苴前人研究之缺漏，並對《韻學源流》的意義與價值有更深層的認識。

二、莫友芝的治學理念與教育志業

白雪華、湛廬（2007）根據現存於台灣的早期抄本，細核稿本中的避帝諱字，得知此書應編成於同治之前的道光、咸豐時期，編纂者應可確認為莫友芝。總合前人考證的結果，本文暫且認定《韻學源流》的編纂者為莫友芝。

⁵ 袁江洋（1997）解釋「科學編史學」的意涵，指出：「廣義科學編史學之主要任務在於：分析形形色色的科學觀與科學史觀，分析科學在不同歷史時代及不同社會條件下的存在方式、在不同層面上的組織或建制形式及運作方式，分析科學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整體發展過程，如何理解科學、如何理解科學史這兩個重要問題，作出綜合性的回答。在此基礎上，重新探討科學史之目標、價值與意義，重新探討其研究範圍、方法論原則及評價標準。」

《韻學源流》全篇僅 19049 字（不含標點符號），內容則概括周秦時期至清代初期漢語音韻學的發展源流。根據陳振寰（1998：7）的統計與評估，書中提及各類人物有 251 人，各類書籍 296 種，術語 112 個，本書之編纂應是設定以「初通音韻學者」為主要對象，性質近似於學堂授課所編製的講義。莫友芝之所以編纂此書，除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外，更考量到實用的價值，這與他個人的治學理念與教育志業有關。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號邵亭，晚號瞿叟，祖籍江南上元，高祖時遷居貴州都勻府獨山州。⁶莫友芝自幼從父親莫與儔（1763-1841）讀書識字，道光三年（1823）隨父親遷至遵義府學任所；道光六年（1826）拜皖派樸學大師程恩澤（1785-1837）為師，並於當年考取州學生員；道光十一年（1831）考取鄉試舉人。莫友芝雖然少年登科，但不汲汲於功名利祿，平日研治許鄭之學，並旁及經史諸子、詩詞古文，或許因對時文帖藝未特別用心，致使此後科舉之途並不順遂，雖曾多次赴京應試，但均下第而返。

莫友芝半生以文化教育為志業，對遵義地區的文化傳播貢獻卓著。道光十四年（1834）收胡長新為弟子，自此步上杏壇；道光二十二年（1842）受聘湘川書院主講；咸豐六年（1856）受聘啓秀書院講席；次年（1857），應貴陽知府劉書年之聘為西席。莫友芝晚年（1858-1871）逃避戰亂、遊歷江南，並專注於目錄版本學之研究，咸豐十一年（1861）入曾國藩幕府，與劉毓崧（1818-1867，劉師培之祖父）、張裕釗（1823-1894）……等幕友詩歌酬唱、研討學問；同治二年（1863）獲唐寫本《說文》殘卷，刊行《唐本說文木部箋異》；同治四年（1865）遷居江寧（南京），應聘入金陵書局擔任校理；同治六年（1867），應丁日昌（1823-1882）之邀，暫留蘇州，整理「持靜齋」藏書；同治七年（1868）又應丁日昌之聘，任蘇州書局總校理，主持刻印《資治通鑑》294 卷；同治九年（1870）受聘為揚州書局校理；同治十年（1871）至揚州、興化一帶訪書，病逝於舟中。

莫友芝雖仕途失意，但在文化教育、編纂方志、收集貴州詩歌與文獻、詩文創作、書畫篆刻、目錄版本、語言文字之學……等方面均有卓越的成就，曾國藩讚譽曰：「其學於考據、詞章二者皆有本原，義理亦踐修不苟。」⁷與鄭珍（1806-1864）齊名，章士釗（1881-1973）并譽之為「西南兩大儒」。莫友芝博學多能、著作等身，比較重要的著作有：《黔詩記略》、《遵義府志》（與鄭珍合纂）、《聲韻考略》、《過庭碎錄》、《邵亭詩抄》、《樗菴譜注》、《唐本說文木部箋異》、《持靜齋藏書紀要》、《宋元舊本書經眼錄》、《邵亭知見傳本書目》等。

在音韻學研究上，莫友芝著有《聲韻考略》四卷、《韻學源流》一卷，其中《聲韻考略》今已不見流傳，羅常培（1929）猜測《韻學源流》或為《聲韻考略》之初稿，經後人輾轉抄錄成編。⁸《韻學源流》以簡潔文字概述一千六百年來漢

⁶ 張裕釗〈徵君莫子偲墓誌銘〉云：「子偲姓莫氏，諱友芝，自號邵亭，晚號瞿叟。世居江南之上元。明弘治中，其遠祖曰先者，從征貴州都勻苗，遂留居都勻。至高祖雲衢，又遷獨山州。自是為獨山人。」

⁷ 見咸豐十一年（1861）九月十四日曾國藩寄給其子曾紀澤的家書。

⁸ 《韻學源流》源自於趙幼愚的校抄本。1918 年，康寶忠將此書刊印出版，並撰序文說明其來

語音韻學發展的軌跡，堪為漢語音韻學史的奠基之作。為何編纂音韻學史的使命會落在莫友芝身上？除了歷史機緣之外，莫友芝本身具備何種學術條件？編纂此書又是基於何種目的呢？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

1.內因一以許鄭之學為本、旁及金石目錄

史家的理想目標，蓋如司馬遷〈報任安書〉所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但想要達成此一理想目標並不容易，就音韻學史的編纂而言，編纂者不僅得要熟悉歷來各類音韻學著作之來龍去脈，並且得對語音的歷時演變過程有所認識。莫友芝是否具備了編纂音韻學史的相關知識呢？張裕釗〈徵君莫子偁墓誌銘〉描述莫友芝的學術背景，指出：

（莫與儔）日以樸學倡其徒，教其子弟。子偁獨一意自刻厲，追其志而從之，當是時，遵義鄭子尹珍亦從教授君游，與子偁相劇以許鄭之學，積五六年，所詣益邃，黔中官師徒友，交口推轂莫子偁、鄭子尹，而兩人名遂冠西南。子偁之學，於蒼雅故訓、六經名物制度靡所不探討，旁及金石目錄家之說，尤究極其奧蹟，疏導源流，辨析正偽，無銖寸差失。

莫友芝自幼篤治許鄭之學、熟知漢學門徑，其學術造詣之精深曾讓曾國藩大為讚嘆。⁹然則，莫友芝生長於西南偏遠之地，為何能夠精通音韻之學呢？追溯莫友芝音韻學之淵源，不難發現有兩位關鍵人物對他影響至鉅：莫與儔與程恩澤。

（1）莫與儔的啓蒙

莫與儔，字猶人，為嘉慶四年（1799）進士，曾入翰林院為庶吉士，在任職翰林院期間，曾與阮元（1764-1849）、紀昀（1724-1805）、洪亮吉（1746-1809）、張惠言（1761-1802）、郝懿行（1757-1825）、姚文田（1758-1827）、王引之（1766-1834）等漢學大家往來問學，¹⁰對於乾嘉樸學有深入接觸。莫與儔兼治漢、宋之學，在棄政從教之後，以「六經宗許鄭，百行法程朱」作為教育準繩，對自家子弟督課甚嚴，精選訓詁典籍及當朝名家論著作為子弟必讀的課本，莫友芝〈顯考莫公行狀〉云：

逮授子友芝經，乃以雅故為本。至遵義，悉購集漢、宋經說，及本朝專門名家者置座右，手日披覽。謂友芝曰：「學者立身行己，當法程、朱，輔以新吾（呂坤）、蘇門（孫逢奇）、潛庵（湯斌）、稼書（陸隴其）之篤近。若言

歷，云：「莫子偁《韻學源流》一卷，為遵義趙幼愚校鈔本。劉申叔入蜀時，幼愚以貽申叔者也。是書海內既無刊本，余所得者又為幼愚、申叔所校定，固應以公同好，而不可自秘也。」羅常培（1929）推測此書本源，云：「考黎庶昌〈莫徵君別傳〉及張裕釗〈莫子偁墓誌銘〉，均載《聲韻考略》四卷，而不及此書，意此書或即《聲韻考略》之初稿而展轉傳抄者耳。」

⁹ 黎庶昌〈莫徵君別傳〉：「丁未（1847）會試，公車報罷，與曾文正公國藩邂逅於琉璃廠書肆，始未相知也。偶舉漢學門戶，文正大驚，扣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儒耶！」」

¹⁰ 莫友芝〈顯考莫公行狀〉云：「及成進士，座主則相國朱公珪、劉公權之、阮公元；又師事相國紀公昀、編修洪公亮吉；而同年友如編修張公惠言、主事郝公懿行、尚書姚公文田、王公引之，講六書、明漢學者數十計，故熟于國朝大師家法淵源。」

著述，我朝大師相承，超軼前代矣。」每舉惠氏《易》、閻氏《書》、胡氏《禹貢》、陳氏《詩》及諸言《禮》家說精核絕者，為友芝指講，曰：「吾少也，不及知，知之矣，又無能得書，今書十九備而吾已老。若輩不及今為之，何及矣！」（轉引自黃萬機，1992：21）

莫與儔長年擔任遵義府學教授，日以樸學教授鄉里子弟，開啓了遵義地區鑽研乾嘉樸學的風氣。陳田（1850-1922）《黔詩記略後編》「莫與儔傳證」云：「吾黔講宋學以定齋（陳法，1692-1766）為大宗，黔士之有漢學，自先生始。厥後先生之五男友芝、門人鄭珍、珍子知同，以考據訓詁之學成書數十種，出與海內碩學證據，推為漢學專家。先生提倡之功偉矣！」（轉引自史繼忠，2010：100）由此可知，正是在父親莫與儔的啓蒙之下，莫友芝得以自小接觸清代漢學大師的一流著作，儲備日後編纂《韻學源流》的音韻知識。

（2）程恩澤的教導

程恩澤（1785-1837），字雲芬，號春海，安徽歙縣人。自幼聰穎過人，稍長從凌廷堪（1757-1809）遊學，盡造其閫奧。從嘉慶九年（1804）中舉，十六年（1811）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道光三年（1823）任貴州學政，六年（1826）轉任湖南學政，十四年（1834）授工部侍郎，轉戶部，十七年（1838）卒于位。程恩澤博學強記、精通考據之學，為清中期皖派樸學的知名學者，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評論其學術成就，云：「天算、地志、六書、訓詁、金石，靡不精究。」

在程恩澤任貴州學政期間（1823-1826），莫友芝與鄭珍二人拜程恩澤為師，皖派樸學「為學以識字為先」的治學理念，勢必也對二人造成深刻的影響。鄭珍晚年有詩追憶學習過程，云：「我為許君學，實自程夫子。憶食石魚山，笑余不識字。從此問鉉錯，稍稍究《滂喜》。相見越七年，刮目視大弟。為點《新附考》，詡過匪石氏（按：鈕樹玉）。公時教惠王，歸沐輒奉几。……」（《巢經巢詩後集》卷二）顯見正是在程恩澤的指導之下，鄭珍才步入漢學之門徑，並且在經學、小學上取得傑出的成就。莫友芝同樣也曾受到程恩澤的指導，道光十五年（1835）冬，莫友芝整裝北行，以應來年春試，當時程恩澤在京師任戶部侍郎，鄭珍作〈追寄莫五北上〉一首，¹¹勉勵莫友芝飽覽山川風光，並至京師拜謁阮元、程恩澤兩位漢學大師，請教漢學之淵源。可見莫友芝之所以能精熟「蒼雅故訓」之學，程恩澤曾經扮演過指導者的角色。

2.外緣一以文化教育為志業

在莫與儔與程恩澤的啓蒙、教導下，莫友芝致力研治文字訓詁之學，奠定日後編纂《韻學源流》的知識基礎。然而，具備音韻知識僅是編纂音韻學史的必備

¹¹ 鄭珍〈追寄莫五北上〉詩云：「……子今偕計趨春官，歷鍊駿骨閱山川。河聲嶽色浩漫漫，吞納胸中同鬱盤。獨慨宿學近頗慳，罕聚輦轂散若煙。阮程二老海內觀，子往謁之問淵源。必有告子乎勉旃。」（《巢經巢詩集》卷三）

條件，必須還要其他外在因素配合，方能付諸實現。試想：清代晚期，精通乾嘉樸學者不乏其人，為何莫友芝特別動心起念，想要編纂出能會通古今源流的音韻學史呢？觸發莫友芝編纂《韻學源流》的外在因素為何？考察莫友芝的時代背景與生活環境，個人以為：《韻學源流》之編纂，與莫友芝半生獻身於文化教育事業有關。

貴州為古夜郎之地，因地理環境阻絕、遠離中原文明的核心，故自古以來被視為偏僻、蠻荒之絕域。然而，清嘉慶以迄光緒年間，在黔北遵義的樂安江畔，卻意外地綻放出異常燦爛的文明火花，形成所謂「沙灘文化」，¹²莫友芝正是建構「沙灘文化」的重要柱石之一。「沙灘文化」的特徵，誠如黎鐸（2010：113）所言：「由家族血緣、姻親關係及師友關係為紐帶，構成一個相對完整、富有地域特徵的文化體系（單元），有著鮮明的親緣性和輻射性」，而維繫、拓展「沙灘文化」的無形力量便是一教育。¹³

莫友芝出身於教育世家，祖父莫強（字健行）為鄉里塾師，父親莫與儔更是將畢生心力投注在教育事業之中。嘉慶六年（1801），莫與儔於翰林院散館之後，改任四川鹽源知縣，後因父喪返鄉；服喪期滿之後，又以奉養母親張太孺人為由，請求暫緩返任，於獨山兔場闢「影山草堂」教育鄉里子弟，並應本州之聘主講「紫泉書院」，前後凡十八年；母歿之後，莫與儔毅然決定棄政從教，於道光二年（1822）呈請改任遵義府學教授，任職達十九年之久，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卒於任所。

莫與儔依循著儒家「經世致用」的理念，曾撰寫〈示諸生教〉四篇以闡發個人的教育思想。從〈示諸生教〉四篇中，可看出莫與儔十分注重品德教育，強調為學應以端正志向為先，要求學生須明義利之辨；主張讀書應當講求實用，而非只是吟詠章句，應從經典中體悟到為人處事的法則，切不能以獵取功名利祿為讀書的主要目標，要能深切體會安貧樂道的道理。此外，莫與儔對於提倡漢學不遺餘力，因深感西南地區文風不盛，特別在遵義府學之內籌建「漢三賢祠」，奉祀漢朝三位貴州先賢—犍為文學（舍人）、盛覽與尹珍，作為黔中學子學習仿效的典範。鄭珍〈漢三賢祠記〉紀錄莫與儔建祠之緣由與用意，云：

莫公呼來告曰：……建元之際，弟子著錄者漸多，齊魯晉燕趙吳楚梁越之間乃始，諸儒雲爛霞蔚，六經賴以復傳。於時西南遠徼，文翁為之倡，相

¹² 根據黃萬機（2010）的研究，「沙灘文化」的概念是出自於浙江大學史地研究所編纂的《遵義新志》。該志主編張其昀在「歷史地理」章中，將遵義兩千年來的發展歷史分成九個時期，其中第八期即為「沙灘期」，《遵義新志》描述此時期以黎氏為主體、鄭氏與莫氏為兩翼所發展出的區域文明，云：「沙灘黎氏為遵郡望族，先世自四川廣安縣遷來。自清乾隆以後，世有賢才。……黎恂字雪樓，於嘉慶十九年（1814）舉進士，官浙江桐鄉縣知縣。浙省素為人文淵藪，頗廣見聞，嘗曰：“人以進士為讀書之終，我以進士為讀書之始。”歸黔後，以廉俸萬金購置書籍。鄭珍（字子尹）以甥行，莫友芝（字子偲）以年家子（其父與儔，字猶人，為遵義府學教授，遂自獨山移家於此），皆從恂治樸學。其後鄭珍、友芝蔚為一時宗匠，號稱“西南大師”。姪黎庶昌（字蓴齋）師事曾文正公，從事經世之學。鄭、莫、黎三家，互為婚姻，衡宇相望，風流餘韻，沾溉百年。」（頁236）

¹³ 教育是「沙灘文化」孕育、形成的關鍵要素，相關討論請參見黎鐸（1995）、石尚彬（1997）、史繼忠（2010）、黃萬機（2010）等人的論述。

如為之師，經術文章燦焉，與鄒魯同風，而文學公、盛公即以其時起於牂柯犍為。東漢以後，儒者始不專一家講說，至許鄭集漢學大成，而尹公乃即起於毋斂。樸常獨居，深念六經堂構於漢儒，守成於宋程朱數子，而大敗壞於明人。及我世祖、聖祖崇樸學，教化海內，一時朝野諸老宿痛懲前代空疏文巧之佛老，吾道而力挽回之，事必求是，言必求誠，支離恟恍之習掃棄淨盡，於是漢學大明，六經之義若揭日月，至今二百年來，數天下鏗鏗說者，一省多且得數十人，獨西南士僅僅，意無乃淵源俎豆之不存歟。（《貞定先生遺集·附錄》）

除了留心學校教育外，莫與儔對於家庭教育更是注重，莫友芝曾將父親平日的教誨、訓示，輯錄成《過庭碎錄》12卷。莫友芝從小耳濡目染，深受莫與儔教育思想的啓迪，在屢試不第的情況下，亦追隨莫與儔的腳步，半生以文化教育為職志。考察莫友芝的生平事蹟，《韻學源流》應是執教期間（1842-1859）所編纂的授課講義。陳振寰（1988：4-5）推測：「如果認為《源流》頗像學堂講義，我們倒寧願設想它也許是莫與儔在遵義府學“日以樸學倡其徒，教其子弟”時的講義而為友芝紀錄整理成篇者。」

莫友芝精熟漢學之淵源與發展，具備編纂音韻學史的基本能力；再者，因長期執教於黔省各書院，必須思考如何將音韻學的發展脈絡以簡明方式教授給鄉里子弟。在內因與外緣聚合之下，便激發出想要編纂音韻學史的衝動。

三、《韻學源流》的內容、形式與音韻史觀

如何客觀評價史書的優劣良窳呢？[唐]劉知幾（661-721）認為史家必須具備「史學」、「史才」、「史識」三種長才。¹⁴所謂「史學」是指學識，即史家不僅對歷史對象有深厚的專業知識，並且還得旁及其他相關的知識；¹⁵「史才」是指文采，史家必須能夠蒐集、鑑別、組織史料，即具備善於敘述、精於編纂的能力；「史識」則是史觀，指史家能以獨到的歷史眼光，判別個別事件的歷史意義、梳理事件的發展始末、論證不同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劉知幾所提出三項史家長才，無疑為我們評鑑音韻學史著作提供判準的依據；換言之，當我們評述《韻學源流》時，也應當分別審視「史學」、「史才」、「史識」三個層面，如此方能對《韻學源流》的意義與價值有更全面性的認識。

¹⁴ 《新唐書·劉知幾傳》云：「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榱桷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

¹⁵ 音韻學史是文化史的一部份，與社會文化的演進有著緊密聯繫。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導言》指出編寫音韻學史，必須注意音韻學發展與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云：「一般文化的演變，對於某種學術，也往往直接的或間接的增進了它研究時所必須的基本智識，供給了它研究時所應用的某種新工具，擴大了它研究時所採取的材料和門徑。因之，我們要窺探一國裡某種學術演進的情形，我們必須注意到這個國家在一般文化上曾經發生過幾次的變動，以及這些變動對於促進這種學術的研究，有怎樣關係。」（頁1）

1. 《韻學源流》的韻學知識

如上文所述，莫友芝自幼篤治許鄭之學，並旁及金石目錄，依照常理推論，莫友芝對於歷代音韻學著作及音韻演變過程應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然而，若剖析《韻學源流》的內容，能否看出編纂者確實具備深厚的音韻學知識呢？對此問題，學者的見解不同、褒貶不一。殷孟倫（1963：434-438）持負面評價，認為《韻學源流》編纂者的知識面十分狹窄，並列舉出以下幾點證據：

- 引用的各書主要不過三種：顧炎武《音論》、戴震《聲韻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餘引用的書絕少。
- 或整段抄錄前人舊說，或稍加竄改顛倒以為己作，未能摭發自己閱讀第一手材料後的心得與看法。
- 多襲用前人謬說，以為定論，未能吸納後人研究成果予以更正。例如：書中引顧炎武《音論》談「韻」字始見，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曾對顧炎武的說法提出糾正，且閻說為戴震《聲韻考》所引，但編纂者未能注意。
- 以「反切」與「古韻」、「今韻」對立，對音韻學範疇的概括不夠仔細，容易產生混亂。
- 抄錄舊說，存在著前後矛盾的現象。例如：論述「古韻」，抄錄顧炎武《音論》，認為「韻」字始見於[晉]陸機〈文賦〉；論述「今韻」，則改寫戴震《聲韻考》，認為魏武、杜夔均有「韻」字，推論韻學應興於漢建安中。

相較之下，陳振寰（1988：5-6）則抱持著寬容的態度。雖然也指出《韻學源流》的矛盾與瑕疵之處，但大體上仍舊肯定編纂者的音韻學根柢，並試著歸納出《韻學源流》中幾項有價值的新見解，茲將陳振寰（1988）的舉證引述如下：

- 《韻學源流》：「六書之諧聲即韻也。」編纂者意識到「同聲必同部」的道理。
- 《韻學源流》：「顧炎武因之而精，著《音學五書》及《韻補正》；江永又因炎武書而益精之，撰《古韻標準》，於是古音之道揭日月而行，後有作者，雖有更小密而二家，亦其支流而已。」編纂者或許意識到「考古」、「審音」這兩條古音學發展路徑。
- 《韻學源流》：「豈《廣韻》二百六韻之目，即法言舊部歟？法言〈序〉既舉支脂仙先等為說，則分部又必不自法言，豈自《聲類》即已有此等部，而四聲既興，又以四聲界之耶？法言又云，諸家有乖互，豈合諸家之部分而去取整齊之耶？」編纂者認識到：李登《聲類》可能已分韻列字；陸法言《切韻》是參酌各家分韻所制訂出來的；《廣韻》二百六韻並非全然來自陸法言之分韻。
- 《韻學源流》：「《廣韻》三鍾恭字下注云：“陸以恭崧縱等入冬韻，非也。”